

# 从恩格斯的视角看当代美国性别政治

严 诣,何俊志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 200433)

**摘 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美国的政治领域,女性逐渐表现出了与男性不同的政治偏好,并最终展现为她们独特的政治行动,形成了当今性别政治所关注的“性别差”。对于这一现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关于女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角色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来源于恩格斯不仅仅将女性主义看作流于形式的权利呼吁,而是将女性看做一种独特的权力类型和政治资源,并且把女性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视为女性权力的真正来源。

**关键词:**性别政治;女性权力;政治资源;公共事业;家庭

**中图分类号:**D440/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6-0050-05

## 一、理解“性别差”与重访恩格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性别差”(Gender Gap)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进入了政治学——特别是美国选举政治学——的分析视野。“性别差”就其字面意义看,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可能包括两性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差距和认知模式上的差异等等。但是当今政治学关于“性别差”的理解是比较简明的,主要指的是“女性和男性在政治立场、政治党派和选择政治家等问题上所持有的观念和态度的差异”<sup>[1]</sup>,同时也包括男性和女性在政治参与中所显示出来的差异性的行动<sup>[2]</sup>。而这种性别差在民主制国家就使得女性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民群体。

在美国,1980 年卡特和里根的总统竞选是女性政治影响力提升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性别差开始影响政治过程的转折点。首先,自 1920 年美国女性获得选举权以来,两性选民的偏好差异第一次显著反映在选票上。<sup>[3]</sup>而从 1980 年的选举开始,美国男性和女性在投票行为中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分歧——女性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而男性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sup>[4]</sup><sup>442</sup>因此,在美国,“性别差”对于民主党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而对于共和党,就需要努力去关闭或者说缩小性别差(Closing the Gender Gap)。2008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是一个例子——希拉里的参选反映了美国主流妇女运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与民主党结成政治联盟的现实,而佩林的参选则是共和党用来抗衡民主党在女性选民中优势的策略。

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性别差”的概念,但是却间接阐释了男性和女性在政治选择上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使得女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对于恩格斯来说,女性群体蕴含了重要的阶级内涵——“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sup>[5]</sup><sup>76</sup>。而且,恩格斯认为女性将会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实际上已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看到了工人阶级被收买的苗头,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女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上。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女性

\* 收稿日期:2013-01-28

作者简介:严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女性将会是最激进的,因为私有制导致性别压迫源泉,而女性天然与私有制相排斥。无产阶级女性摧毁了父权制的基础,实现了真正的性爱。如恩格斯所言:“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成为而且才可能成为对妇女关系的常规……在无产阶级家庭中,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sup>[5]73</sup>恩格斯在这里努力地将男女不平等的观念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展示出来,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女性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独特魅力。这也表明,恩格斯明显意识到,在将来的政治进程中,性别将发挥持续性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也离不开这种特殊的政治资源。

恩格斯的这一预言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性别政治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佐证。罗伯特·夏皮罗和哈普瑞特·马哈詹对美国1960年代到1980年代性别对于政策偏好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反对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中使用武力、建造核设施,更加倾向于支持平衡预算、就业保证、公共医疗保险、助学贷款等等。<sup>[6]</sup>因此,不管是从党派选择(女性倾向于选择民主党),还是政策偏好上来看,女性在政治立场上都是倾向于左翼的。

不过,女性的这种政治立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是不同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皮帕·诺里斯在一份基于对60个国家的价值观分析上,得出结论认为:在后工业社会,女性在政治观点上是倾向于左翼的,而传统的女性则相对保守,倾向于右翼。<sup>[4]441-463</sup>也就是说,随着一国从传统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女性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越来越激进,越来越“革命”。虽然说,这并不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会马上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去,但至少说明女性作为一种新兴的左翼政治力量,在不断抗拒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而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与恩格斯的预言是一致的。

## 二、“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女性政治偏好的变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紧密相关。虽然,在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9条修正案,承认女性也具有投票权,标志着第一波妇女运动的胜利。<sup>[7]</sup>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形成投票行为中的性别差,也没有形成学者们所估计的女性投票集团。而且,由于男性和女性的范畴面临着太多的交叉分裂(Crosscutting Cleavages),性别相对于宗教、阶级和地域,也没有被当作一个主要的选民层。也就是说,即使1920年女性被赋予了投票权,女性的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保守的,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前文已经提到,美国性别差出现的转折点是在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里根在竞选中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支持传统家庭的价值观并强调对苏联的进攻性策略,使得许多女性选民投向了民主党的怀抱。而自此以后,不仅仅是总统选举,包括国会选举,性别差都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即女性与民主党结盟,而男性与共和党结盟。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1980年性别差的影响会凸显呢?为什么女性的政治立场会与左翼党派联盟呢?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恩格斯的《起源》中找到富有解释力的答案。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sup>[5]76</sup>他实际上认为这种经济关系改变会使妇女产生自己的独立意识,就像工人产生阶级意识一样。女性走出家庭这个狭小的私人空间,奔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能够使原本原子化和处于隔离状态的女性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一股革命的力量。这似乎是恩格斯所论述的女性解放的精髓。而单纯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法律形式并不能为性别平等提供保障,正如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到的一样,“纯法律的论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资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抚无产者的论据一样”,这种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并不能掩盖男女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因此,恩格斯向我们呈现的是,女性的解放、女性影响力的扩大必须让她们参与到公共的生活中,从而摆脱自己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我们完全可以假设,1980年代美国性别差的凸显和恩格斯笔下的“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是密切相关的。

而实际情况也验证了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和公共生活之间联系的看法”。“重回公共事业”确

实发生在美国女性的身上。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比例从1950年的33.9%上升到1994年的58.8%。<sup>[8]</sup>同时,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对于妇女支持女性主义的政策、成为政治上的行动者是有推动作用的,这也使得女性开始质疑传统的性别角色。<sup>[9]</sup>女性回到公共领域使她们作为女性选民能够更多地讨论政治,而且使她们更方便地交流选举的信息。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女性何以能够回到公共生活中?恩格斯的提示是“家庭”。

“分工”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sup>[10]84</sup>,而男女之间的分工也是最为原始和最为自然的分工。但是专偶制家庭给分工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如恩格斯所说:“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家务料理失去了它的公共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关了。”<sup>[5]75</sup>而在阶级社会中,女性长期被羁绊在家庭中,这与她们在前阶级社会中独立的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分工特别体现在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上,而前者被解释为“男性”的领域,后者被解释为“女性”的领域。<sup>[11]</sup>女性被隔离在各自的原子家庭中,疲累于各种厨房和看护杂事,在经济上依赖于她们的丈夫。也就是说,家庭束缚着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有许多经典的研究假设,已婚的女性倾向于在政治观点上附和她的丈夫。而且女性的自身利益也由于传统家庭婚姻中的性别分工而依附于男性。<sup>[12]</sup>我们可以发现恩格斯也认为传统的婚姻实际上也是一种阶级统治,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单纯以性爱为基础的情感共同体。<sup>[5]82-85</sup>

不过,美国的家庭和家庭观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变化是巨大的,并且深刻影响了它的性别政治。美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大大降低了婚姻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一方面,美国的离婚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而且婚姻观念上发生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女性对丈夫的依赖也越来越小,从而制度化的婚姻对她们的限制也越来越无力。<sup>[13]</sup>美国近几十年来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女性“重返公共事业”成为可能,她们即使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家庭的束缚,也已经在观念上和经济上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并为她们真正地成为一种显性的社会权力奠定了基石。

女性的政治影响力离不开她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又建立在家庭结构和观念变化的基础之上。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sup>[5]168</sup>虽然没有经历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们发现后工业社会按照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让女性“返回到公共事业中”,使得女性的地位获得了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女性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力量,对政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女性的政治态度也如恩格斯所料,当她们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之后,日渐地成为了一种左翼的力量,甚至是激进的革命力量。虽然不至于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所热衷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恩格斯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 三、女性意识与阶级意识

当代女权运动的勃兴本来就是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投射。女权运动和女权理论本身的发展就处于恩格斯——甚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为阶级革命框释的逻辑中。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生活,她们逐渐地获得了独立的“女性意识”(Feminist Consciousness)。也就是说女性获得自己的独立意识与她们走出封闭的私人家庭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在恩格斯看来,性别和阶级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共享着一些基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性别问题,就肯定绕不开阶级问题,也绕不开阶级社会中的家庭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意识”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女性意识”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

女性走出封闭和隔离的家庭、走向公共生活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女性自我认同(Feminist Identification)和女性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在封闭的家庭中,女性的独立意识是薄弱的,她们完全没

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男性统治的权力关系之下，所有的规则都是理所当然和不言自明的。只有当她们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她们才能够确定自我身份认同，并行成独立意识。而女权主义既作为一种理论，又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就是女性获得这种特殊的“阶级意识”的极端表现形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女性没有形成这种独立意识，政治参与和政治立场上的性别差是很难凸显的。

虽然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没有对女性阶级意识多加阐述，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是把这个问题放在整个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这个总问题下来考虑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将法国农民的状况描述成为由“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一袋马铃薯”，虽然他们有相同的经济状况和相似的生活条件，但是由于缺少各种形式的交流，他们缺乏彼此间的共同联系。<sup>[10]677</sup>被隔离在家庭中的女性，如同法国农民也存在着相似的状况，由于缺乏频繁的互动和交流，使得她们难以形成阶级意识。

事实上，女性意识的缺乏使得她们的集体行动十分困难。埃尔斯特将“阶级意识”看作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他将“阶级意识”定义为“在实现阶级利益中克服不劳而获者的问题”<sup>[14]</sup>。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女性不能有效地形成自我认同和意识，女权主义的集体行动就是很难发生的。一旦女性也从“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的阶级”，那么这就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所以说，当代美国政治中的性别差的形成和女性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关键在于女性自我认同的强化。

如果说，女性政治影响力扩大的关键就在于“女性意识”的觉醒，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女性自我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女性往往会在公共领域感受到明显的不平等待遇，比如求职、工资等等，而这促使她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类的性别在遭受歧视。当然，这种挫败感对于女性意识的形成是必要的，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发现许多女性对于歧视仍然是逆来顺受的。

更关键的是，美国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让她们的政治知识得以积累，并且质疑既有的性别权力关系，并挑战支撑它的话语体系。<sup>[15]</sup>因此，在女性自我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教育和灌输可能是比“挫败感”更为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学术单位中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崛起，使她们能够将话语权影响和渗透进男性的学术世界，而且通过言传身教引导自己的学生，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女性知识分子成为了与男性不同的知识生产者。和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往往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力。美国 1966 年成立的全国妇女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就是以培养和选举女性政治家为目的从而实现两性平等的。不管是女性知识分子，还是女性政治家，她们都活跃在公共舞台上，并且一直影响着普通女性的认知。

#### 四、对理解我国性别政治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从这个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sup>[16]</sup>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启示在于它不仅将两性平等视为一个应然权利，更将性别视为一种建立在特殊偏好之上的权力类型。这一分析视角对于理解我国性别政治发展的来龙去脉是颇有帮助的。

总的来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性别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和两种不同的路径：

第一阶段，自上而下的外生型性别政治。自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的定位，中国共产党把女性群体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资源，并一直致力于实现女性的权力参与。因此，在动员体制的驱动下，我国的性别政治首先走了一条由国家驱动的自上而下的路径——在基层，动员广大城乡女性积极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在精英层，设定女性干部比例，安排女性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可以说，这种外生型的性别政治形态贯穿了改革开放前那充满激情却又曲折发展的 30 年。

但是，这种动员式的性别政治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一方面，国家动员的性别政治很可能与其所依赖的社会形态脱节，从而只能实现形式上的权利平等，而这种平等是脱离了它的社会权力基础

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仍然是男权中心,参与政治的女性会严重地男性化,从而根本无法发挥她们在政治过程中的细腻气质。在这种“性别政治”中,“男女平等”意味着“男女一样”——两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都是趋同于男性的,而“性别差”这个概念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有数量庞大的女性通过动员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但如果她们没有差异性的偏好和处事作风,真正意义上的性别政治也就并不一定存在。

第二阶段,自下而上的内生型性别政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使我国性别政治的发展由外生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内生型,也就是从社会中——而不是国家中——发展出来的性别政治。而这种发展与美国战后性别政治的发展尤为相似。首先,由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离,女性和男性在思考和行动逻辑上的差异性也就逐渐凸显出来;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后女性参政保障的取消,以及市场经济对女性的排斥,加上女性对于公共生活的追求,都使得女性的自我群体性认同在加强;再者,社会各界涌现出越来越多优秀的女性,代表着女性真正的社会影响力在增强。所有这些发展都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影响力会逐渐地自下而上地延伸进政治领域。

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交错的高速发展时期,也处在改革的攻坚时期。随着女性群体影响力的增加,她们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民群体;同时,作为对既有制度的意见者,她们也很可能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未来的改革需要发掘女性群体在改革事业中的潜力。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让女性真正地以她们本来的面目参与到政治中——以她们独有的细腻而柔情的方式来影响政治,很可能远比她们在政坛上扮成一个男性强人来得更加有效。

#### 参考文献:

- [1] 张璐. 希拉里与佩林:妇女运动、性别政治和美国总统大选[J]. 美国研究,2009(1):80-97.
- [2] Pamela J. Conover. Feminists and the Gender Gap[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88, 50(4):985-986.
- [3] Carol Mueller. The Gender Gap and Women's Political Influence[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1, 515:23-37.
- [4] Ronald Inglehart & Pippa Norris. 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the Gender Gap: Women's and Men's Voting Behavior in Global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21(4):441-463.
- [5]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6] Robert Y. Shapiro & Harpreet Mahaja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cy Preferences: A Summary of Trend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J].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6, 50(1):42-61.
- [7] Susan MacManus. Voter Participation and Turnout: It's a New Game, Gender and Election: Sharing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6:45.
- [8] Jeff Manza & Clem Brooks. The Gender Gap i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en? Why? Implication?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8, (103)5: 1235-1266.
- [9] Alice Rossi. Beyond the Gender Gap: Women's Bid for Political Power[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83, 64:718-733.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4.
- [11] (美)阿莉森·贾格尔. 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M]. 孟鑫,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02.
- [12] Heidi I. Hartmann. The Family as the Locus of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Struggle: The Example of Housework[J]. Signs, 1981, 6(3):366-394.
- [13] Daphne Spain & Suzanne Bianchi. Balancing Act: Motherhood, Marriage and Employment among American Women[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6:246.
- [14] (美)乔恩·埃尔斯特. 理解马克思[M]. 何怀远,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27.
- [15] Mary Ann Dzuback.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2007, 43(2):171-195.
- [1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0.